

經韻樓集「附」

補編
兩考

(清)段玉裁 撰
趙航 薛正興 整理

H11
46

2573352

段玉裁
樓集
附

補編
兩考

段玉裁
撰
趙航
薛正興
整理

《段玉裁全集》之二



SEU 2573352
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（C I P）數據

經韻樓集：附補編·兩考 /（清）段玉裁著；趙航，薛正興整理。——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0.12

（《段玉裁全集》之二）

ISBN 978-7-5506-0144-4

I. ①經… II. ①段… ②趙… ③薛… III. ①漢語—古音—音韻學—研究②禮儀—研究—中國—古代 IV.

①H11②K224.06③K892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0)第265148號

書名 經韻樓集:附補編·兩考

著作者 (清)段玉裁 著 趙航 薛正興 整理

責任編輯 王華寶

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

發行部電話025—83223462

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

印刷 江蘇新華印刷廠

南京市新港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 郵編:210038

開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張 18.125

字數 496千字

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
標準書號 ISBN 978-7-5506-0144-4

定價 76.00圓

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電話:025-68037411)

前言

段玉裁（一七三五—一八一五），字若膺，曾字喬林、淳甫，號茂堂，又號硯北居士，晚年自號長塘湖居士，喬吳老人。出身于清代江蘇省鎮江府金壇縣的一個耕讀世家。是著名的經學家、文字音韻訓詁學家、文獻校勘學家。乾嘉學派中的著名學者，一代宗師。段氏精通典籍，勇于創新，著述宏富，見解精湛。據劉盼遂編著《段玉裁先生年譜》後附「先生著述考略」所列，其自著、校批、纂輯的著作有二十九種，加上其他資料提供的信息，共有三十八種之多。除標明不分卷、若干卷及校本無從統計卷數外，共有七百二十卷，約四百萬字。大體分爲九類：一、經部著作八部：《古文尚書撰異》、《毛氏故訓傳定本小箋》、《詩經小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周禮漢讀考》、《儀禮漢讀考》、《禮記四郊小學疏證》、《釋拜》；二、文字學著作四部：《說文解字讀》、《說文解字注》、《汲古閣說文訂》、《說文補正》（附于《水經》校正中，底稿本）；三、音韻學著作三部：《詩經韻譜》、《群經韻譜》、《六書音均表》；四、校勘、考證類著作十二部：《春秋左氏古經》、《春秋五十凡輯本》、《（盧本）方言校本》、《一切經音義校本》（與顧廣圻同校）、《廣韻校定本》、《集韻校定本》、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》（參與審定）、《經典釋文校本》、《國語校定本》、《列女傳校定本》、《荀子校定本》、《中水考》；五、方志學二部：《壽陽縣志》、《富順縣志》；六、年譜一部：《戴東原先生年譜》；七、文集類四部：《經韻樓集》、《經韻樓續集》、《經韻樓集外文》、《經韻樓叢書》；八、存目書三部：《漢書地理志音釋》、《說文轉注釋例》、《段大令詩》；九、其它類一部：《明史十二論》。以上三十八種著作中，有「同書异名」的，如《詩經》之與《詩經小學》；有「繁簡之別」的，如《說文解字注》是根據長編《說文解字讀》概括而成的；有「初稿與定稿」關係的，如《詩經韻譜》、

《群經韻譜》和《六書音均表》；有單獨成篇而又重見于「文集」的，如《釋拜》、《中水考》、《明史十二論》；也有論文匯編的初編、續編、補編、總編而分列爲四部書的，如《經韻樓集》；還有有目而未見書的，如《說文轉注釋例》、《段大令詩》等。這樣一來，除校勘古代文獻的著作和上述種種情況，段玉裁最主要的著作是十三種。如果把所著《年譜》和所修《縣志》再排除的話，應該是八種：即《古文尚書撰異》、《毛詩故訓傳》、《詩經小學》、《說文解字注》、《六書音均表》、《周禮漢讀考》、《儀禮漢讀考》、《經韻樓集》。基本上是經學和小學兩類。《清經解》均予以收錄。

清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），人們盼望已久的《說文解字注》，經過許多人的共同努力，終於刊成面世了。可僅僅過去三個月，一代宗師、《說文注》的作者段玉裁，就悄然離開了人間。令他欣慰的是自己親眼見到了這部著作，大半生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，至于《段注》問世後產生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，更是他始料所未及的。相比之下，段氏其他著作就沒有這麼幸運了。比如，他的文集《經韻樓集》（以下簡稱《文集》），雖有嘉慶刻本，但那出自後人所編，已是段氏謝世以後的事情了。

七葉衍祥堂藏版的十二卷本《文集》，幾乎收錄了段玉裁除已印行的和尚未印行的專著以外的全部論文、雜著，包括經說、字釋、書札、序跋、壽序、墓表、傳記、題辭、題材廣泛，內容豐富。對於研究段氏的學術思想，研究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術史，都有極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指導意義。

這部《文集》，共收入近三百篇文章，其中卷四的《與郝戶部論爾雅書》、卷七的《戴東原先生配享朱子祠議》和《上大興朱中堂書》是「存目闕文」，卷十二的《儀禮漢讀考》是未寫完的一部專著，當抽出另列，卷七的《記洞過水》，又見于段氏所刻《戴東原集十二卷》之卷六，均爲「代壽陽令龔導江作」，寫作時間均爲乾隆三十四年己丑，且二文一字不異，未知是段作還是戴作，待考。《文集》的其他文章，從所注明的寫作年月考核，前後達五十年之久，涵蓋了段玉裁光輝的一生。我們通讀段氏這部《文集》，包括劉盼遂先生輯校的《經韻樓文

集補編》，就會被他的立論鮮明、學識精深所折服，就會發現他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和鮮亮的個性。段記《文集》的最大特點應該是它的真實性、學術性。真實性，是指在內容上的敢講真話。段玉裁這位可敬可愛的老人，並不因為逝世已近兩百年而減少人緣，自省、自律，勇于解剖自己，是一個重要原因；所謂學術性，是他的「序跋」皆緣于「文籍」，「書札」多為「論學」，就連「墓表」、「壽序」一類文章，也都「知其人，論其世」，或表彰節行、操守，或闡述「以書卷自養而多壽」的哲理。

按照文章的內容和體制，可以分為以下八類。

一、考字說經類 段玉裁是一直堅持「以字考經，以經考字」的理念的，《文集》中有關「三禮」、「毛詩」、「春秋三傳」等論文，就是對這一理念的具體闡述。「三禮」歷來以文辭簡奧、禮節繁縟著稱，段玉裁憑借他經學家的精深和小學家的睿智，命題作文，大多發前人所未發，匡謬正俗，往往切中肯綮。在十三篇談「禮」的文章中，四篇是「概論」，九篇是「專論」。屬于「概論」的四篇，一篇考證《儀禮》書名的，一篇考證《古喪服經傳》無子夏傳三字說。另外兩篇是《周禮漢讀考序》和《書周禮漢讀考後》，着重闡發他閱讀《周禮》漢注總結的三個條例及對所發現「未確處」的補救。「專論」九篇中，《某讀為某誤易說》，搜集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穆天子傳》及《文選》等著作里的部分用例，說明「先用注說改正文，嗣又用已改之正文改注」，是治理古籍所經常出現的毛病；《且字考》是對古注「且字」用法混亂情況的梳理和訂正；其餘幾篇，集中論述《儀禮》的「喪服」。「喪服」依照親疏差別分為斬衰、齊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緦麻五等，即所謂「五服」，「五服」又根據衣裳的細密程度（升）、喪棒的質地和形制（杖）、服喪期的長短等因素分為十一個級別，段氏的文章幾乎均有精辟的分析。

《詩經》類文章大都集中在卷一，《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》，是對自己厘定《毛詩故訓傳》的序言。他為了保存古義，對毛詩世傳本重加整理，正訛誤，補脫落，考同異，定是非，是他的得意之作。對黃堯圃（丕烈）所藏「毛詩」殘本的「跋語」，旨在說明它的作用是可以校正殿本，這是別的本子無法替代的；《讀詩序禮

經二注》一文作于晚年，他從古注的自相鉅鑄、訛舛闕字中得其是非，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，自信、自喜，溢于言表。《濟盈不濡軌》以下幾篇，或者考釋「軌」與「軌」、「腕」與「腕」、「炮」與「包」、「采」與「采」的區別，或者從《大雅·大明》的「摯中氏任」，引申出春秋時代男女氏、姓的使用習慣，或者從《魯頌·閟宮》的第十二章共十句，前七句講的是魯國建造宮室的事，「奚斯所作」以下三句，講主持這一偉大工程的人是魯國大夫「奚斯」，段氏從文法上論證這種倒叙手法的普遍性。

卷四一組十七篇文章，以「春秋三傳」為主（其中有《孟子》、《爾雅》四篇），《春秋左氏古經題辭》和《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》屬于一類，說明經、注的綱、目關係是「讀經以尋傳，讀傳以釋經」；另外就是交代阮元《校勘記》所依據的版本及校勘條例；辨別「殺」、「弑」用法等篇，是強調正君臣名分的傳統觀念。

二、考釋詞語類 段氏考釋詞語的最大特點是突破傳統的重形不重音的束縛，重視形音義的相互依存，運用綜合分析的方法，講清古代典籍中許多不易說清的問題。除了前面所舉的例子外，有幾篇文章很有典型性。如卷五的《胸忍考》，考察了胸忍、曲蟪、蚯蟪均為「一音之轉」，找出「其地下濕，多胸忍蟲，因以名縣」的根據。《說荷》一文，則對「荷」、「茄」、「薔」、「菡萏」、「蓮」、「藕」分別表示植物的葉、莖、本、華、實、根，揭示了同義詞產生的一般規律。卷六的《釋拜》是一篇一萬多字的長篇論文，後來又以單卷本形式刊刻，足見其影響之大。他批評了當時有代表性的方以智、顧炎武、閻若璩三家在自己相關著作中對「拜」解釋的錯誤，詳細分析了古代禮拜的方式和儀節，說明「九拜」間的細微差別，是段氏治禮的重要成果。

三、研究音韻類 段氏古韻學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他的《六書音均表》中，《文集》中單篇論文，都是對自己音韻學觀點的深化和補充。寫于晚年的《答江晉三論韻》，就系統解釋所列古韻六類十七部的背景、原因。他認為，清代古韻研究有成就的是顧（炎武）、江（永）、戴（東原）、段（玉裁）、孔（廣森）五人，江（有誥）殿其後，「集五家之成」。他說：「（足下）能確知所以支、脂、之分為三之本源乎，何以陳、隋以前支韵必獨用、千萬中

不一誤乎，足下沈潛好學，當必能窺其機倪。僕老耄，倘得聞而死，豈非大幸也。」非常形象地表現段玉裁很自負又十分謙虛的性格特征。《聲類表序》是爲戴東原的《聲類表》而作。戴氏《聲類表》成書于乾隆四十二年（一七七七），「距易簣之期僅二十日，未及爲例言」，戴的好友孔誦伯刊刻《聲類表》的時候，把戴作于乾隆四十一年《答段若膺論韻》放在文章前面，權作例言，直到三十三年後的清嘉慶十四年（一八〇九），段玉裁才寫了這篇序言。這一年，戴已逝世三十三年了，在戴的陰陽入三聲相配基礎上，推闡爲陰陽對轉學說而成一家之言的孔廣森，也逝世二十二年，段玉裁自己也是七十五歲的老人，撫今追昔，物是人非，國喪碩彥，感慨良多。他充分肯定老師所改定的九類二十五部，是「綱領既張，纖悉畢舉」，集諸家大成的一部著作，又極力推崇孔廣森「東、冬爲二以配侯、幽，尤微妙悟」，巧妙地指出戴的不足。

四、考證輿地類 表現在對《漢書·地理志注》及《水經注》的校釋上。《地理志》記錄郡國地理的具體方位，是研究秦漢以前地理沿革的主要依據。《漢書》作者班固及其後各家，均爲之作過注，但由於長期傳抄翻刻，文字衍奪脫誤很多，給後人利用這部書帶來很大困難。段玉裁的「校」「釋」，首先是從「校勘」開始的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全文近三萬字，他究竟校了多少，有沒有校完，今天已無法知道。現在從《文集》中看到的，僅有京兆尹、左馮翊、右扶風、弘農郡、河東郡（錄至「蒲城」），不足全文的七分之一。他的學生江沅說：「以下未及錄出，此中班氏原注亦未全引，俟他日備錄後則成一書。」俟他日而杳杳無期，最終使本該完整的校勘專著成爲殘卷。《地理志觀縣考》、《胸忍考》、《溲濡灤三字考》等篇，可以看作是校釋《地理志》的樣本。如《觀縣考》一文，他考證「畔」「觀」本二縣名，并引數條書證證明「觀縣」前所冠「畔」是衍文，「自宋刻已聯綴不分，近人著述莫之諛正。」這個結論，至今仍爲學術界所接受。

第二個主要内容是關於《水經注》的系列文章。《水經》是我國第一部記載國家水脈的著作，北魏酈道元的《水經注》，是集此前研究《水經》的大成。清代校釋「酈注」的，大致分順康、乾嘉、道咸以下三個時期。乾

嘉時期的研究，以分別經、注的成績最爲突出，具有代表性的是全（祖望）、趙（一清）、戴（震）三家。三家之中，全氏成書最早，趙氏次之，戴氏又次之。而從刊行時間說，戴氏却早于趙氏。因此，趙、戴之間有無互相參考、甚至抄襲現象，竟成了學術界的一大疑案。梁玉繩、梁履繩兄弟在校刊趙氏《水經注釋》時，凡發現經、注互訛處，往往採納戴說以補正趙氏的不足，却又未明確注明「參取東原氏爲之」。爲了維護老師的聲譽，段氏作了《與梁曜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》，責備他不應襲戴，特別是不具名引用，容易造成後人「或謂戴取趙，或謂趙取戴」的誤會。當然，段氏本人對《水經》，在師戴之前就頗感興趣，收入「文集」卷七的《中水考》（上下）、《校水經江水》、《校水經溱水注》、《水經注三澁沱在南郡郢縣北》、《水經無派河》、《記洞過水》，都是經得起時間考驗、很有深度的力作。

戴氏還受人之請，撰《直隸河渠書》，後被人刪繁就簡，改頭換面，以《畿輔安瀾志》面世。段氏《與方葆巖制府書》、《與方葆巖》就是爲此而作。

五、論述校讎類 段玉裁本是文獻校勘學家，這一點，往往會被他的文字音韻訓詁成就所掩蓋。在校勘方面，他的功力之深、識斷之精，是一般學者所難以企及的。最著名的《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》一文，提出校勘必須辨底本是非和立說是非的問題，底本又必須還原作者原來面貌，然後立說的結論才具有可靠性。其他關於校勘學的名言，見於《文集》的很多，如《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》中反對「死校」：「凡宋版古書，信其是處則從之，信其非處則改之，其疑而不定者，則姑存以俟之。不得勿論其是非，不敢改易一字，意欲存其真，適滋後來之惑也。」在《與胡孝廉世琦書》中又提出「從事經學，蓋有三難：淹博難，識斷難，審定難。僕以爲定本子之是非，存乎淹博，定作書者之是非，則存乎識斷、審定」。除校勘理論的建樹外，據劉盼遂所編《段玉裁先生年譜》和其他資料統計，經他批校的著作就有十二種，收入《文集》（補編）的有《校本集韻跋》、《校本經典釋文跋》、《校本廣韻跋》等。

六、據「禮」力爭類 在「文集」中，關於「禮制」的文章比較顯眼。一組是維護禮制的正統觀念的，《明世宗非禮論》和作為本組論文的導語部分的《明三大案論》共十篇。從第一篇寫于「丁卯十月」，到最後一篇寫于「甲戌閏二月」，即嘉慶十二年到嘉慶十九年的七年間。晚年的段玉裁突然對明朝嘉靖皇帝（明世宗）感興趣，這是因為它是歷史上轟動朝野的一場爭論。明世宗朱厚熜是從他的叔伯兄弟朱厚照（明武宗）手中接過王位的。這種「兄終弟繼」的特殊性，就必然牽涉到明世宗的生父朱佑樞的封號問題。當時「禮官集議」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：一派主張維護大宗不絕傳統，以弘治帝朱佑樞為皇考，以生父為皇叔父；一派主張「繼統不繼嗣」，尊其生父為興獻皇帝（其生父曾封為興獻王）。明世宗是贊成後一種觀點的，段玉裁根據禮制「為人後者為之子」的規定，認為世宗應該後武宗，應對武宗行父子之禮，不如此，就是「不篡而篡」，違反傳統。充分反映了他在學術上追求真理的精神。

另一組是段、顧關於《禮記·王制》「虞庠在國之西郊」中「西郊」、「四郊」之爭。包括卷十一的《與顧千里書》、《答顧千里書》和卷十二《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》七篇及《與黃紹武書》、《與陳仲魚書》、《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》等十多篇文章。矛盾由一字之爭擴大到對方學術觀點、學術方法的否定。這場爭論產生的原因，既有個人原因，也有社會原因。從個人來說，固執己見，自視很高，造成互不相讓，互不服輸；從社會原因來說，段玉裁堅守的「皖派」更強調「立說之是非」，在校勘上把「理校」，即由義理推斷古籍底本之是非，作為重要手段之一；顧千里（廣圻）師從惠棟，強調「不校之校」，寧可保持古籍原貌，也不輕易改動文字。所以，段、顧之爭也不排除學派之間的成見。從這場論爭中，我們感受到的是那種堅持真理的理論勇氣和敢于講真話的學術良知。為了弄清《禮記》中一句話、一個字的正訛，段氏撰寫了四千字的《禮記四郊小學疏證》，僅討論顧氏的《論學制備忘之記》，就連續寫了超過萬言的七封書札。這對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他有一種堅強的信念，即相信真理之光終究要透過雲霧，照亮人們心田的昏暗的。敢于爭辯，勇于提

出自己獨到見解，是段氏對待學術的一貫態度。在《說文注》中，就經常出現表揚或批評先賢、時賢的例子，是是非非，絕不含糊。他的見解是他研究的心得，他的觀點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。他反對人云亦云，朝秦暮楚，他更鄙視那些左右逢源、見風使舵的投機文人。他認為陳陳相因，只會堵塞思路、葬送學術的發展。他的批評會使人膽戰心驚，也會讓人豁然開朗，字里行間都凝聚着他對學術的執着和良知。爭論帶給我們的另一個啓示，是段玉裁對自己學術觀點的正確性充滿着自信。自信心是人生成功的最重要的動力，也是標新立異、不斷提出問題、解決問題的必備條件。一個人，即使在強大的壓力下，也都能保留難能可貴的懷疑精神和獨立思考精神，這是產生自信心的取之不盡的力量源泉。段氏的學術實踐證明，他完全做到了這一點。他不輕易迷信古人，也不輕易迷信別人，對別人著作及其觀點，他善于運用科學方法給予鑒定。孔子說的「學而不思則罔」，《禮記》上說的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」，都是要求善于讀書、善于思考的。有了思考，就有疑點，就不會盲從，就樹立了信心。對待古代典籍及前人的注釋，通過學習消化，吸取其正確部分，這是「先學後信」的科學態度，而不是「先信後學」的因循守舊。在「科學」與「迷信」的對立中，段氏始終採取科學的態度，這是值得我們繼承、借鑒的。

七、論學勉學類 這類文章中有「書序」，如文集序、專書序、遺書序；有「書後」，如《書漢書楊雄傳後》、《書十祿字書後》；有「說解」，如《在明明德在親民說》、《吳都賦蕉葛竹越解》，都談到論學勉學的內容。而更多的是論學書札、文籍題跋。段氏勤于筆札，善于思考，凡友生質疑問難，無不詳細解答；自己點勘書籍，多有題跋。在近三十篇文章中，大體包括以下類型：

或對專書作評介的：如北宋夏竦編撰的《古文四聲韻》，雖依《切韻》分列，但比《切韻》的二百零六韻多出四韻，為二百一十韻，他的朋友孔體生（繼涵）曾向段求教，段當時「愧未能答」。這篇寫于乾隆丙午（五十一年，一七八六）二月的「跋語」，就是借評介該書體例，回復孔繼涵的問題。《刻聲韻考序》既概括戴書的主

要特點，又表明自己所撰《六書音均表》的「學有師承」。段氏對江晉三的《音學十書》評價極高。他在所作《江氏音學序》中說：「蓋顧氏及余，皆考古功多，審音功淺；江氏、戴氏二者皆深；而晉三于二者尤深。」在另一篇《答江晉三論韻》中，段明確表示江是清朝研究古韻的代表人物的殿軍，這里又說他考古、審音兩方面都超過前輩學者，表達了段氏對後來居上的年輕人的推崇和贊許。

或辨析書目的：《孟子字義疏證》是戴震的一部代表作，他用訓詁的方法論證《孟子》字義，疏理、發揮作者「理存于欲」的哲學思想。據段玉裁所知，該書創始于乙酉、丙戌，成于己丑（一七六五年—一七六九年），即為《緒言》；改定于丙申冬後、丁酉春前（一七七六年—一七七七年），即為《孟子字義疏證》。戴于是年（一七七七）一月《答彭進士允初書》和四月作札與段玉裁均云，「僕生平著述最大者，為《孟子字義疏證》一書」。因此，認為孔荖谷（繼涵）所刻《孟子字義疏證》「尚非定本，其定本改名《緒言》」的說法「恐不其然」，故段作《答程易田文書》加以分析。

或以「刍蕘之說」糾正疏漏：《與阮芸臺書》辨別「世父」、「舅氏」、「行狀」的用法；《與錢辛楣學士書論糴字》；《與張涵齋書》論《歸去來辭》的「巾車」之「巾」是「拂拭」的意思。

或闡述為學的態度：《與胡孝廉世琦書》是通過肯定胡著《小爾雅疏證》，想到讀書的「細心綜核」的重要，引發出從事經學要達到淹博、識斷、審定三個境界。《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》，則通過蜀刻《孟子音義》的「未盡善」，說明對宋本書也要採取信則從、非則改、疑則存的實事求是態度。《左傳刊杜序》在表揚張聰咸（阮林）的《左傳杜注辨正》敢于對杜注規難發違的同時，揭示著書「不求勝于前人，而真是未嘗不在其間」的道理。

「跋語」、「書後」中的《集韻》、《廣韻》、《經典釋文》、《宋咸熙輯古周易音訓跋》及《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寫本書後》、《書干祿字書後》等文中，也都透露了段氏論學、勉學的精辟見解。

八、書信詩什類 《文集·補編》中收錄段玉裁與朋友邵二雲(晉涵)、劉端臨(臺拱)、王懷祖(念孫)等人的信函四十五件。這些信函雖也有論學的內容,但更多的是互致問候,暢叙友情。其中交往最多的是劉端臨。劉端臨,江蘇省寶應縣人。學問博通,自天文律呂之學以及六書、九數、聲韵,無所不究,尤深于考證文字音韵。乾隆五十七年(一七九二),劉銓授鎮江府丹徒縣學訓導,嘉慶六年(一八〇一),其父劉世壽(官靖江訓導)疾,端臨辭官歸。在鎮江前後有十七年。段玉裁自乾隆辛丑年(一七八一)「巫山引疾歸」,到乾隆五十八年(一七九三)「移家居蘇州」,長住金壇,小住鎮江達十二年,這種特殊的地理條件,更加拉近了他們的距離,使他們接觸更多,交往更頻繁。在所有信函里,與劉端臨的往來信件有三十一封。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廣泛,《年譜》說,「凡家常身世,米鹽凌雜,疾苦之增損,著書之程序,胥在焉」。茲舉比較重要的幾個方面,予以介紹:一是「交流著述」。《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》是乾隆四十九年完成的,十多年後,即乾隆六十年,段玉裁連續三次給劉端臨寫信,或者表示自己對該書的評價,告訴他「凡朱筆注處,皆弟恆心貴當之言,最堪探討」。或者說明自己想抽出時間繼續修改的打算,也有是向對方提出希望的,「是否已令人謄寫一部。再校補數四,則大妙矣」。直到嘉慶元年正月,他又一次對劉端臨說,「《毛詩傳》隨時欲添補,不知何時妥之。」反復強調治學的嚴謹。《周禮漢讀考》刻成後,他立即寫信給劉,「此書成于潤州雨花庵,翻閱之功少,後來亦未大改」。言下之意,自己還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。乾隆五十五年,他說自己本打算把《古文尚書撰異》的草稿謄錄清楚,但入夏以來,身體、情緒一直不好,只好待秋涼再動筆了。在乾隆五十七年的信中,段說「欲將《三禮注》校爲定本,刊之垂後」。在一次給劉的信中,又向劉通報了校正《儀禮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傳,所用的本子以及「校正《儀禮》頗有創見」的得意。乾隆五十九年,段告訴劉,改正汲古閣《說文訂》「亦是快事」。又說,「新刻《釋文》,苦翻閱有不愜之處,恨不得暇全校之」。二是「治學體會」。這既體現在論文中,也散見于書信中。在談到寫作《說文解字注》的心得時說,「胸中充積既多,觸處逢源,無所窒礙,言簡而明」,這是所

謂「厚積薄發」的最好注釋。他還無限感慨地說：「弟于學問深有所見，若一切纏繞，不盡所長，蓋福命之薄耳」。三是「商量家事」。段玉裁大到訴訟案件，小到兒女婚姻、代買食品，都很坦率地向朋友求援。乾隆五十五年，段氏家里因相信迷信遷葬祖塋，而所徙新阡，又未與地主商妥，雙方爭執乃至動武，段父因此受傷。段向本縣提出訴訟，可一直没有得到公正處理。爲此他特地寫信給劉端臨，請他疏通關節。段希望劉做一下鎮江知府工作，讓知府和金壇縣令打招呼。信中云：「太尊說與未說，宋（指縣令——引者注）之允與未允，皆未能知。」表達段心情的急迫。段的四弟段玉立工作無着落，段也寫信要劉代爲關心。段還把兩個兒子分家的事、科舉事、在蘇買房子的事，都一一寫信和劉商量。寶應河網縱橫，盛產藕粉，段也寫信托他，「尊處易覓真藕粉，乞寄數斤」。兩人之親密無間，可見一斑。四是「抒發感受」。乾隆五十八年前後，段家因遭橫逆，舉家遷至蘇州，人地生疏，心緒如焚。所以在給劉的信中，傾訴了自己的心情和處境。說自己心脈甚虛，左臂疼得很厲害，恐怕從此不能讀書了。又說，精力大不如從前，就怕《說文注》的事要半途而廢了。段氏六十歲後右腳疼痛，「而腳痛之外，加以瘡爛疥煩，輾轉兩月，全廢書本」。兩個學生爲他代刻了《周禮漢讀考》一書，段寫信給劉，一方面感謝學生的盛情，一方面又復閱一遍，「又得誤處二事」。鑒于自己蒲柳之質，常年多病，深怕《說文》巨著不能完成，他曾先後寫信給劉，想請王引之、臧庸、顧廣圻等踵其事，他們或無暇，或赴外地，或杳無回書，都未幫上忙。但從另一側面，反映段對這些晚輩的器重和厚愛。從段與劉臺拱的十幾年的書信往來中，我們深深感受到他們的情真意切、情同手足的友誼。而這種友誼，不是一種裝飾，而是一種相互信任基礎上的默契。它成爲生活上相互依存、事業上相互促進的支撐力量，不可或缺的力量。段玉裁從他們身上汲取了豐富的營養，拓寬了自己的知識領域，改善了自己的知識結構，這是段氏成爲學術大師的重要條件。

附詩四首，均爲即景感懷之作，但于靜謐幽清的描寫中，抒發了作者懷古思鄉的情懷。讓我們從另一個

側面了解段氏少時慕爲詞的藝術才華。

這部《文集》，凝聚了段氏一生學術思想、學術觀點的精華，正面闡述部分，固然是淋漓盡致，自我否定部分，也是毫不留情。比如，《周禮漢讀考》成書于乾隆五十九年（一七九四），刻于嘉慶三年（一七九八）。一年之後的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），段氏「偶一復閱，則已有未確處」，于是寫了《書周禮漢讀考後》加以糾正，並且感嘆說：「因記于此，以見古書難讀，搜討無盡。」這既是真正學問家的胸懷，又是他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。

《文集》卷八的《潛研堂文集序》，段玉裁曾對一個人的「文集」發表過這樣的感慨：「古人以別集自見者多矣，而多不傳；傳矣，而不能久傳；且久矣，而或不著。其傳而久、久而著者，數十家而已。其何故哉？蓋學有純駁淺深，而文又有工拙之不等也。」他用這樣眼光來評價錢大昕的《潛研堂文集》是合衆藝而精深、擁多能而兼擅的大家之作，他的文章「傳而能久、久而愈著」是歷史的必然。這話是嘉慶十一年（一八〇六）講的，也在這一年，錢氏次子錢東塾主持的《潛研堂全書》首次結集推出。一百九十年後，四百萬字的《嘉定錢大昕全集》，又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。這充分證明段說的準確性、預見性。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段氏自己的《文集》，自然也是恰如其分的。

《段玉裁全集》之二是點校本，包括的內容是「一集兩考」：「一集」指十二卷本的《經韻樓集》和所附劉盼遂先生輯校的《經韻樓文集補編》（上、下兩卷）；「兩考」指《周禮漢讀考》和《儀禮漢讀考》。《周禮漢讀考》曾單卷刊刻，《儀禮漢讀考》是段氏的未完稿，原附于《經韻樓集》十二卷後，現爲體例的統一，移至《周禮漢讀考》後，單獨成篇。《經韻樓集》（含「補編」）部分和「兩考」部分合刊，分別由趙航、薛正興點校。

《經韻樓集》十二卷，最早是嘉慶七葉衍祥堂刻本，其次是道光元年刻本。段玉裁逝世于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），嘉慶二十五年就改元了。所以，嘉慶本刊刻的時間只能是段氏逝後的五年。這五年間，段家也發生很大變化，先是段氏所藏書籍，以白銀三千兩賣給了女婿龔麗正。接着，段的兩個兒子也都搬出校園舊

宅，長子安貧樂道，次子殷實而棄文，所以嘉慶本就很難尋覓了。目前，能看到的本子是注有「七葉衍祥堂藏版」的道光本，金壇段玉裁紀念館有藏。我們這次校勘，就以這個本子為底本（簡稱「家刻本」或「原刻本」）。清阮元編的《皇清經解》所收《經韻樓集》，或全錄或節錄，並間有校改，見江蘇鳳凰出版社（原江蘇古籍出版社）二〇〇五年影印出版的《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》第五冊、第八十七種（共六卷），作為對校本（簡稱「經解本」）。

可資參校的資料主要有：清阮元主持校刻的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》，一九八〇年中華書局影印本（簡稱「注疏本」）；段玉裁委托臧在東（庸）、顧子述（明）增編、經韻樓藏版的十二卷本《戴東原集》（簡稱「戴集本」）；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的《高郵王氏遺書》影印本（簡稱「遺書本」）；民國二十一年劉文興編、刊載于是年《國學季刊》第三卷的《劉端臨先生年譜》（簡稱「劉譜本」）等。

江蘇鳳凰出版社社長姜小青編審、副總編輯倪培翔編審、編輯室主任王華寶編審，他們對出版《段玉裁全集》的工作，一直給予極大的支持和幫助，對於《經韻樓集》的點校出版，一直給予熱情指導和精心策劃，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謝意。

本書的「兩考」（《周禮漢讀考》和《儀禮漢讀考》）部分，是段玉裁分析概括漢儒經注的創見和一大發明，在訓詁學上有着極大的實用價值和歷史地位。點校這部分任務是由薛正興編審承擔的。我和正興兄相識於三十年前，他讀研時的二位導師，洪誠先生和徐復先生，同時也為我們訓詁班授課，二位先生的人品學問、道德文章，一直是我們共同學習的榜樣。洪、徐二位先師已分別於一九八〇年、二〇〇六年逝世，星隕山頽，思之泫然。薪火再傳先師的精神業績，弟子們自然是義不容辭的。該做的和能做的事情還很多。可就在這承前啓後的關鍵時刻，正興兄竟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突然離世，令人悲痛不已。薛兄生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，今年九月十四日走的，享年六十八歲。幾成絕學的訓詁學，又少了一位中流砥柱，「兩考」注也

成了他的絕筆。「暢叙未償先得計，空留遺札在朋儔」，本書的出版也是對薛正興兄的一份紀念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二〇〇八年出版的、鍾敬華先生校點的《經韵樓集》，是國內目前見到的該書的第一個校點本。筆路藍縷，實屬不易，給予我們的工作以很大幫助和很大參考，我們對鍾敬華先生表示感謝。在校點中，我們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，也改正了「鍾本」句讀、校勘的訛誤之處凡二百多條。是否有當，祈望鍾先生指正。雖然我們以敬畏之心從事這項工作，但由于才疏學淺，疏漏不妥之處在所難免，敬請讀者不吝批評。

南京曉莊學院 趙 航

二〇一〇年九月，

於南京城西江東居室